

创刊号



历史文化学院 2002 级考古班

## 发刊词

博者，广也。考古天地，广阔无穷。探索人类起源，知晓文明传承，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考古人为之奋斗，矢志不渝。源于对考古的向往，我们成为了新一代的考古人。继承前辈大师们的优良传统，年青的我们，也想为考古学略尽一份绵薄之力，创办《博苑》，只为让更多的人了解考古，关注考古。

创刊伊始，年青的我们没有能力独立撰稿，便邀请了我院资深教授蔡凤书、方辉老师为我们撰写文章，同时同学们搜集资料，整理编定而成。资金的缺乏，经验的不足，肯定会使这份刊物存在不少瑕疵，但我们衷心希望，凝结了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 2002 级所有同学心血的这份刊物，能得到大家的首肯。刊物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在此，也对关心支持我们的老师和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刊编辑部

2003.11.28



###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本报讯）10月26日---29日，由山东大学、山东省文化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eties in Eastern China)在我校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的80多位考古专家参加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先生、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文德安女士、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周艺先生、山东大学副校长王琪琨参加了会议并为大会致辞。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中国东方古代的文明化进程。主要探讨东方文明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及东方文明本身的特点。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栾丰实教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高广仁教授、山东省考古所张学海教授分别以“海岱地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淮系文化新说”和“海岱文明的再思考”为题，为大会作了主题发言，介绍了海岱文化区及淮系文化的产生、发展、鼎盛直至与中华文明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的复杂过程。与会学者、专家还就东方文明进程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并赴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齐故城博物馆和桐林考古发掘工地等地考察。

本次大会的召开，表明中华文明起源越来越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重视，中华文明的理论问题、文化进程问题，都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广泛兴趣。同时，本次会议对于促进中外专家合作交流，开展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唐宁）

# 我校考古学系创建的前前后后

蔡凤书

我校历史系从 1954 年开设了《考古学通论》的课程，主讲教师是已故的刘敦愿先生。但是这门课时断时续，用刘敦愿先生的话来说，一来了政治运动，考古学就得让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考古学被视为“厚古薄今”的代表。

1960 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东大学，按照当时系主任蒋捷夫先生的愿望是让我配合刘敦愿先生加强文物室的管理，待条件成熟的时候组建考古专业。可是 1960 年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最艰苦的时刻，食物短缺，资金匮乏，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那时连饭也吃不上困难。考古学自然靠边站了，我被下放在本校代食品加工厂劳动。我在那里劳动了八个月后，有一次成仿吾校长到厂视察，他得知我是考古学科班出身，立即告诉陪他视察的校人事处的干部，马上停止我在工厂中从事学非所用的劳动，叫我第二天回系，这是 1961 年夏天的事。

自 1961 到 1966 年我和刘敦愿先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一直没有放弃对考古学执着的追求。这期间我们多次调查济南市大辛庄和章丘龙山镇及平陵城等遗址；常常到泰安大汉，采集标本；还根据一幅古画发现了著名的胶县三里河遗址，成为考古学界的佳话；在滕县岗上村和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进行了小型发掘，我们还到日照、诸城、高密、五莲等地参观考察，事后都写了报告，大部分在考古学刊物或本校《文史哲》发表。由于基本上没有经费来源，我们进行野外调查常常是拣最便宜的小旅馆住，甚至于有时不得不住在课堂，以节约那少得可怜的差旅费。1961 年在滕县岗上村发掘时往往以煮熟的豆饼充饥。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们矢志不移，苦中有乐，乐而忘返。现在山东大学博物馆有些珍贵文物就是在那几年搜集的。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教师们毫无例外地受到了冲击；文史楼二楼的文物室成了造反派们审讯“牛鬼蛇神”的地方，文物散乱，丢失严重，一片凋零。到 1970 年山东大学文科迁移到曲阜，在装箱托运过程中，许多文物再次散失，满目疮痍，令人痛心疾首。

1971 年年底情况有了好转。这年 12 月中旬在济南市召开了一次全省的文物工作会议，会上由“省革委”负责文教部门的军代表宣布决定：在山东大学成立考古专业。我回到曲阜将这一决定如实向领导汇报，学校的领导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决定毫无思想准备，临时指定由刘敦愿先生和我为主，并把在校负责摄影的李兆年先生调来组成了考古学教研室。因为 12 月到来年春天新生入学只有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夜以继日的作各种准备，寒假和春节也没有过好。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真是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多年的愿望即将实现，刘敦愿先生幽默地用样板戏“沙家浜”的一句台词说：“沙奶奶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担心的是我们教学的力量太单薄，弄不好岂不误人子弟？我和刘敦愿先生即使是连轴转也只能在一学期担任四门课。怎么办？我们只好到各地请救兵，1972 年我们请了北京大学李伯谦先生(现在是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到北京图书馆约请了徐自强先生，南下徐州借调了阎孝慈先生，在山东省博物馆聘请了张学海

和王恩田二位专家。摄影课由李兆年先生担任，测量课请了本校数学系的教师授课。这一年虽然磕磕绊绊，但总算是“功德圆满”。不但完成教学任务，而且还在泗水尹家城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田野发掘实习，这次实习巩固了课堂知识也锻炼了实际技能，教师们通过发掘为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奠定了基础。80 年代我们又对泗水尹家城实施连续发掘，获得巨大成功，被列入“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1990 年出版了《泗水尹家城》一书，在国内外得到一致的好评。



70年代中期,我们陆续从各地或本校调进教师,同时派于海广等年轻教师到北京大学长期进修,叫宋百川先生作短期学习;我本人也不断到北大和考古研究所“充电”。到1976年山东大学全部搬回济南的时候,考古学教研室已经有七位教员了,基本上克服了捉襟见肘的局面。当时在社会上有句流行的话是“少花钱,多办事”。我们是“不花钱也办事”,我们没有实习经费,只好随同山东省博物馆以及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外出发掘实习。这期间我们发掘了泰安大汶口、日照东海峪、临淄桓公台和河崖头、兖州王因等重要遗址。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受到考古研究所专家们的赞赏。教师们既摸索出一套教学法,同时也在掌握新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一批高质量的论文,为国内考古学专家们所瞩目。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科学研究也迎来了春天。我校考古学专业同其他学科一样在70年代末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教研室的专业教师和教辅人员最多时达到十六人,各门课程的开设都可以独立进行,建立了教研室的陈列室和实验室,有自己的库房,一切都开始正规化。到80年代中期已经开设十几门专业课,而且有了硕士点。教师们出版的教材和专著有十三部之多。《考古学通论》被十八所大学采用为教材。独立发掘的遗址从过去的“单打一”发展到“全面开花”。这期间我们在邹平县丁公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同时在泗水、宁阳、枣庄、莒县、临沂等地进行研究。90年代在邹平丁公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方城址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92年发现全国首例“龙山陶文”轰动世界,也并非偶然,这是考古专业全体师生长年坚持不懈努力拼搏的结果。1995年在长清仙人台遗址发掘成果巨大,这次发现的六座西周时代贵族墓葬出土大批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和骨蚌器,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上乘,尤其是周代的列鼎和有铭文的青铜器,是我省首次发现,被评为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96年在长清县双乳山发掘的巨型汉墓,气势恢弘,和60年代在河北省满城发掘的汉代刘胜夫妇的崖墓媲美,这是一座西汉时代王族墓,该墓的出土品1998年在日本山口县展出时受到热烈欢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95年开始考古教研室的部分教师还和美国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威斯康星大学以及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联合

在日照市实施“区域系统调查”,这个调查队的正副队长分别由我和美国的文德安博士担任,队员都具有副教授以上的职称,平均年龄43岁,五年来我们的足迹遍及以两城镇为中心的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到目前为止发现古代遗址700多处,其中仅龙山文化遗址就有近300处,取得的成绩是空前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中国和美国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国际考古学界的重视。自1998年起我们又在两城镇进行了局部发掘,我们期待着更大的成功。

现在我们这个专业已经建成了考古学系,有了博士点,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学者在成长,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从内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回顾山东大学考古系产生的前前后后,我深刻体会到只要国家的政治安定,政策对头,再加上同志们有团结一致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我还想引用毛泽东同志在一首词中写到“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话。我们今后的任务仍然艰巨,来不得半点懈怠。

回顾这段历史,作为镜鉴,以此和年轻的朋友们共勉。

2003年春,我校考古系00级本科学生在方辉教授的带领下,在大辛庄遗址进行了考古实习,发现了一大批重要的商代遗迹和遗物,并首次在殷墟外首次发现甲骨文。这批甲骨文共有34个甲骨文字,提到了3种祭祀,大辛庄甲骨文是在殷墟之外第一次出土商代卜辞,是甲骨学史上具有界标意义的重大发现。上述发现,将对甲骨学、商代考古和历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还发现了新的族徽文字;为山东地区商文化的分期提供新资料;03年大辛庄考古的主要收获是进一步揭示了上古社会的庐山真面:大辛庄遗址全盛期是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二期,面积超过730万平方米,是一处地区文化中心,这一发现对以后研究大辛庄以及周围的古文明将有重要意义(编者注)。

# 从考古学看环境保护

方辉



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这一问题。只不过,在长达三百多万年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更多地是依赖自然,受到诸如地形地貌、气候、植被等多种环境因素的制约。到了大约一万年前,在世界上主要文明区域,采集、狩猎经济逐渐为定居农业所取代。定居农业的出现,使人类基本上做到了衣食无虞,并且出现了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促使人类进入了以等级和阶级为特征的复杂社会,即酋邦和国家社会。社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大大增强了人类开发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粮食种类的增加、良种(包括家畜家禽)的培育,尤其是大规模灌溉农业的发展,使得人口数量猛增,在局部地区达到极致——有限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人口过快增长的需要。我国的考古发现表明,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

的发展大约在 4500 年前就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分布的密度几倍甚至十几倍于先前的文化遗址。在某些区域,属于这两个文化的遗址的密度甚至比现在的村庄还要大。这时的人们还发明了水井,可以到远离河流的地区去生活。种种迹象表明,人类对土地的利用已经达到了极限。水井的发明,与其说是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不如说是人类对已经变化了的自然的适应。

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高峰。高耸的城墙、威严的祭坛、神秘莫测的玉器、鬼斧神工的蛋壳陶器等等,可以作为它们的代表。但不要忘记,这些文明成就都是建立在以“刀耕火种”、对自然高度破坏的基础之上的,人们迟早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到了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晚期,上述地区出现了文明衰退的趋势。遗址的密度降低了,人工制品也趋于粗糙。到了距今大约 4200 年至 4000 年,良渚文明和龙山文明最终走向末路。文明失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区域性、表现非常原始的落后文化。而遗址的密度,不及前者的十分之一。我曾经用战争引起的民族迁徙来解释龙山文化晚期的衰败,有的学者则试图用“洪水”解释这一文化现象。现在看来,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在生态环境方面。洪水和战争只不过是生态失衡带来的结果而已。

上述的结论是建立在我们的考察和研究基础上,目前尚需要更多的论据,尤其是生态方面的证据。考古学是一个综合性学科,需要多学科的参与。

人类和自然是一个系统。系统内的一个方面出现变化,必然会引起另一方面的反映。当一方发展到极致,便预示着系统的崩溃。“人定胜天”的口号虽然豪迈,但却忽略了“天”对“人”的反作用力。历史和现实中的例子已经很多。愿我们携起手来,为创建一个绿色地球而并肩努力。



# 锋芒初试

李健

考古是一门大学问。

近代意义上的考古有一个来世纪左右的时间，在中国这个时间则更短，大约在 70 年，经历过三四代学者的努力，比如说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贾兰坡等等诸位大家。

中国在考古学方面把中国分为六大区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以洞庭湖与四川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而这么大区东方、南方、东南方；面向欧亚的三大

考

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晋中、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系，又可分为面向海洋的三大块，即块，即北方、中原和西南部。

就中国和世界古文化，广义的北方中的大西北联系着中亚和西亚，大东北联系着东北亚，东南沿海和中西南地区则与环太平洋和东南亚、南亚次大陆联系广泛，源于草原文化的因素都带有西方色彩，琉璃器及铁器这些因素在中、西亚是周人和秦人把西方这些因素带到草原来的，这就将中国和欧亚大陆连起来了。而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的关系则突出表现为段石钺、突出眼睛部位的神人的艺术风格等因素与环太平洋诸文化中同类因素可能有渊源关系。

古

中国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基，其证据在渤海湾西侧阳源县泥河湾桑干河畔，那里有上百米厚的黄土堆积，顶部有一万多年的虎梁遗址，底部则有 100 万年前的东谷坨文化。他们代表目前已知的旧石器文化的一头一尾，而且都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代表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流。

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在于世界接轨的同时必然也要面向未来，实现古今接轨，要思考人类要面临的根本问题，如民族传统与的关系等等。这是全人类的问题，也是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在几十年中得到了长足发展，成就，例如四川盆地的三星堆窖藏，中原的仰化等等。为世人瞩目，但我们应看到它的不足，更多的证据存在争议，国外有“中国有敦煌但就需要考古界的努力。

小议

现代化的关系，人与自然要长期探索的问题。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韶文化、山东的龙山文例如元谋人的年代缺乏没有敦煌学”的说法。这

综上所述，中国的考古有辉煌过去，有更辉煌的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材料均摘自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斩  
露  
头  
角

赵  
志  
锋



## 汝窑瓷器发展简述

汝窑因地处汝州而得名，汝州位于河南腹地，嵩山和伏牛山相间的丘陵地带。历史上河南瓷业发达，各地窑口都为汝窑的创烧有着积极的影响。

到了宋代，农业技术的提高促进了手工业的进步，瓷业比以前更加昌盛。汴京作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加促进了河南地区瓷业的发展。汝窑的工匠在这一时期，发挥其独特的智慧，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刻、划和印花青瓷，汝窑瓷器从北宋初年就已问世。

北宋晚期徽宗大观时，命汝州建青瓷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宫廷垄断时期，由于宫廷用器不计成本，以玛瑙为釉，使釉色光亮莹润多变。由于宫廷垄断之汝官器产量有限，传世甚少，其产品质量及其釉色，这个时期应为鼎盛时期。金元时期，汝青釉制品仍继续生产，但已失去了北宋时精湛的工艺技术，釉色混浊，器胎粗厚，造型简单，不太注重装饰，与“名瓷之首，汝窑为魁”的称誉大不相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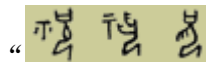
总之，汝窑由宋初创烧，经过演变与发展，到了北宋晚期曾一度为宫廷烧制御用品，进入黄金时期。而到了金元时期，虽有恢复之举，然已达不到宋汝之传统瓷艺，技术失传，生产大降。元末已至尾声，明代则全部停烧。汝窑前后共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程，其间烧制出一批精良作品，在中国青瓷史上独树一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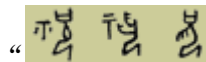
## 浅谈甲骨文与古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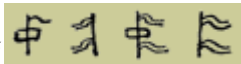
中国古文字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图形文字，甲骨文，金文，古文（包括石刻文，竹简，帛书，陶文，古玺文，货币文等），秦篆，汉隶及楷化以后的汉字的过程。汉字的源头即是图形文字，以后逐渐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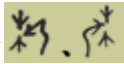
图形文字是一种带有浓厚模仿性的文字，图形简明而又惟妙惟肖。如“万”字，就以蝎子之形象征，以它表示数量之多，取义于蝎子的繁殖力特别强。再如“重”字，字是一个正在吃力的背着一个状如口袋的东西，弓着背，用以表示物件之重，字的构造，就很有理性了。关于图形文字，认识并不很多，争论也比较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发展到甲骨文阶段，文字便成熟了很多。甲骨文是我国三千多年前商王朝晚期盘庚迁殷至帝辛亡国二七三年之间的遗物。题材面较窄，多限于卜噬之用。甲骨文的字型比较多样，由于刻在骨或甲上，线条较刚硬。当然，我们仍可得出许多字的感性认识。如



“”:甲骨文“祝”字，从“示”从“兄”，象人跪于神主之前有所祷告之形，

字或省示。《说文》：“祝，祭主赞词者。再如“”象飘带，中间之口，应是一方形箱子，四面标明方向。故甲骨文“中”字，象风向标，可随风向转动，而立柱恒

居中央而不动”。再如“”象以斤断木之形，即“折”字。斤，古人用以砍斫木

头的横刃斧子。再如 甲骨文牛字，象牛头形。再如 象人张口吹气。当然，研究甲骨文的大师也是很多的，如“甲骨四堂”、董作宾、于省吾、徐中舒等。

文字发展到金文阶段，内容更加丰富，造型也更加成熟。金文的字体就比较优美了，增添了许多浑厚。但是由于讹传，金文的许多字已经体现不出当时造它的本意来了。再发展到古文，篆书阶段，就更加成熟了。篆书时，字形就十分优美了。圆润细致，落落大方，可以说达到了古文字发展的最高峰。在其后出现的汉隶，是古文字与现代字的分水岭，与现在的汉字已基本相同。

关于古文字，以上只是一点浅薄认识，期待与各位同学的共同探讨。

(刘青彬)

# 金文

梁国庆

金文是在商周青铜器上刻铸的文字，又称钟鼎文、铭文。早在商朝晚期，青铜器上已有铭文，字数较少，用来表明该青铜器的用途、主人、制作人。当时，金文的字形因去甲骨文不远，故字形近似。金文盛行于两周。西周时，许多青铜器均有铭文，并且有多达500字的大篇长文。西周后期，金文字形渐趋规整，东周青铜器也有许多铭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金文的内容，有国王、贵族的征伐功勋、赏赐策命、盟誓契约、祭典训诰等，反映了西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诸方面的情况。周代金文，从总的情况看，它比商代甲骨文进一步稳定、规范、简化和符号化了；若与以后的小篆比，则结构仍未定型，部分字的笔画增减、偏旁部首的安排仍有某种随意性。特别是周初金文因承袭商代文字，还保留了比甲骨文更加原始、图画性更强的形态。金文字体，结构疏密相间，比甲骨文方正整齐，笔画分布均匀对称，笔道比甲骨文粗，字的体势较甲骨文雍容厚重。西周晚期，金文被人整理成为一种新的样式，称为“大篆”。据《汉书·艺文志》和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所说，小篆完全出自史籀大篆。史籀是周宣王时的史官，他把金文整理成“大篆”，用大篆写成50篇文字，作为教儿童识字的教材，并且成为当时的标准字体。但史籀大篆50篇早已佚亡。大篆的字体结构比较繁复，体势近于小篆，而有些字又较其后的字体小篆繁复。秦的统一文字小篆由它脱化而出。

利簋（临潼出土西周青铜器）

译文：武征商唯甲子朝钺（越）鼎克昏夙又（有）商辛未王在阑师易（赐）又（有）

事利金用作（作）檀公宝尊彝

附：（唐兰先生）武征商唯甲子朝越鼎克昏扬又（有）商辛未王才（在）阑师易（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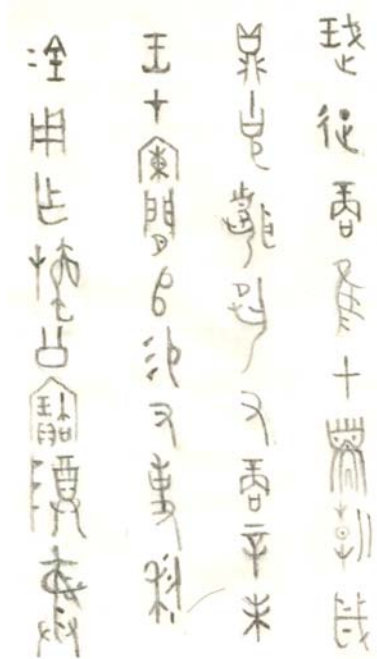
又（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徐中舒先生）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则）克闻夙又商辛未王在阑师易又事利金用作

公宝尊彝

释文：周武王征伐商朝。甲子这天早上，夺得九鼎，打败了一向昏庸的商纣王朝。辛未这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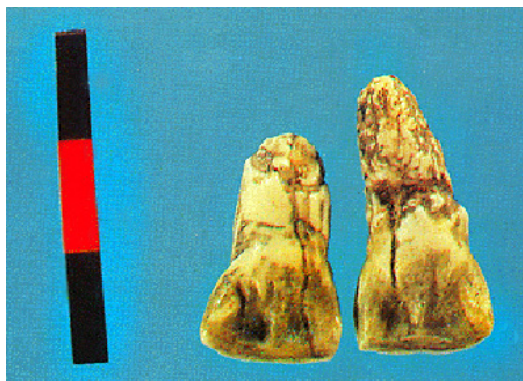
武王在阑师这个地方，赐给一个名叫利的有司（有事）铜。利用（铜）做祭祀檀公的宝器。



# 什么是遗物

**遗**物是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生产工具、武器、日用器具及装饰品等。也包括墓葬的随葬品和墓中的画像石、画像砖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石经、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一般而言，遗物都经过人类有意识的加工和使用，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也必须与人类活动有关而能够反映人类活动，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遗物的分类方法较多，按其材质可分为石器、陶器、骨角器、金属器、玉石器等；按用途分则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随葬品等。一种遗物之下则可按类型学方法分为若干型式。

遗物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因而它们能够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情况。由于地域、时代与民族的不同，各种遗物的用材（石、木、陶、金属——青铜与铁等）、制作方法及其形制、风格亦各不相同，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考古学对人类所遗留下来的各种遗物的研究，不应仅限于类别、类型的研究及年代的鉴定和用途的确定，而是要通过对遗物的研究去了解人类古代社会的社会生活、生产技术水平及文化面貌。同时，既要研究同一时期各地区人类社会间的相互影响与传播关系，也要注意人类社会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继承、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与规律。



迹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遗址、墓葬、灰坑、岩画、窖藏及游牧民族所遗留下的活动痕迹等。其中遗址又可细分为城堡废墟、宫殿址、村址、居址、作坊址、寺庙址等，还包括当时的一些经济性的建筑遗存，如山地矿穴、采石坑、窑穴、仓库、水渠、水井、窑址等；防卫性的设施如壕沟、栅栏、围墙、边塞烽燧、长城、界壕及屯戍遗存等也属此类。

由于地域、时代及民族的不同，遗迹的面貌也各不一样。就新石器时代的居址而言，各地居室的形式与营建方式各不相同，山区有洞穴居址，沿海有贝丘遗存，湖泊沼泽地带则有干栏式建筑，平原地带如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盛行粘土木构建筑居室或半地穴居址等。其他如城堡建筑，古代墓葬，包括帝王贵族陵墓的各种埋葬坑，诸如人殉坑、兽殉坑、车马坑等，也都显示着地区、时代及民族的各自的独特风俗、风格。

一般地说，遗迹是经过人类有意识加工的，因而能够反映当时人类的活动。遗迹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代居址能够提供关于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状况方面的完整的、重要的资料，据此可以阐明这一遗址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特征和内容。发掘古代墓葬，可以研究不同种族的体质特征，了解古代埋葬风俗及墓葬形制；同时通过随葬品可以了解古代工艺水平及社会经济生活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情况。通过各种遗迹及遗物的综合研究，对于了解古代社会的发展史有很大帮助。

(蒋岚)

# 什么是遗迹

指导老师：陈晓莹

封面题字：杨加深

主    编：唐  宁

编    委：刘青彬  蒋  岚  
          李  健  梁国庆  
          张贵宏  王良智



感谢您的支持 期待您的关注